

我国群众体育参与主体身份的历史审视

张爱红

(北京体育大学附属竞技体校, 北京 100084)

摘要: 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 探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人民”和“群众”的特定历史含义, 以及由这些参与主体的特性所决定的该时期群众体育的时代特色。主要结论: 新中国成立初期群众体育的发展路线是当时国内外环境影响的历史必然, 有着时代的合理性; 但其过分强调政治、强化整体效果, 而忽视群众个体需要的做法, 也可为我国现代群众体育的发展提供历史反思。

关键词: 群众体育; 体育史; 新中国

1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群众体育参与主体身份的确立

1949年9月30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48条规定“提倡国民体育”。1949年10月26-27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体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上, 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向大会致辞, 指出“现在我们的体育事业, 一定要为人民服务, 要为国防和国民健康的利益服务”^[1]。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7年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向大会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国民体育》的报告, 提出“体育应当为人民服务, 要使少数人的运动成为国民的普及的运动, 使之从学校发展到工厂到部队, 从城市发展到农村, 从知识青年发展到劳动群众中去”^[2]。

1950年7月20日的全国体育工作者暑期学习会上, 冯文彬作了《关于开展人民体育的几个问题》的报告, 辩证地阐述了新中国开展体育运动的目的与方向。报告进一步明确“我们体育运动

的目的, 是为了增进国民的健康, 为了发展新中国的建设和巩固新中国的国防”^[3]。

1952年6月10日, 为迎接将于6月20日召开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 毛泽东作了“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的题词。

1954年1月16日, 中央体委主任贺龙同志在对1953年的体育工作总结报告中明确提出: “当前开展体育运动的方针应当是: 结合实际情况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 并逐步地使之普及和经常化。”^[4]

由此看出, 在当时中央领导人最初的体育建设构想中, 体育就是群众体育, 是“国民”、“人民”、“群众”参与的身体运动, 使“我们的人民个个都身体强壮、精力充沛、不怕困难、勇往直前, 具有大无畏精神, 这样才能更好地担负起建设祖国和捍卫祖国的任务”。“国民”、“人民”、“群众”这些称谓体现了在当时群众体育的建设中, 参与主体是以集体的身份出现的, 他们是一个整体, 是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赖以存在的基础。

作者简介: 张爱红(1973-), 女, 山东高唐人。讲师, 博士在读, 主要从事体育史研究。

Tel: 13661002310, E-mail: zhangah_2009@yahoo.com.cn。

2 群众体育参与主体身份决定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群众体育的特点

2.1 群众体育参与主体身份称谓的辨析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人民政府特别强调体育的国民性，一方面是由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决定的。人民民主政权初建，必须唤起全国人民的认同感并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共同对抗反对、敌视、包围、封锁新中国的帝国主义势力。另一方面也是改造国民性，重塑我国人民形象的需要。近代中国，人民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压迫和愚弄，贫病交加，身体羸弱，被称为“东亚病夫”。为了实现民族振兴，不但要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还要提高人民体质、焕发人民精神。

人们民主专政的新政权推翻了旧政权，必然受旧政权既得利益者的仇视。人民是新政权的主人，打倒反动的阶级敌人，维护新政权是人民的权利和义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语境中，人民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具有神圣的政治权力。新中国的体育也必须依靠人民，服务于人民。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历程中，群众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就认识到“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周围，热烈的拥护我们”^[5]。可见，在中国共产党眼中，群众是团结的对象，群众的规模可以扩大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由此，新中国体育要想真正实现“普及化”，必须最大限度地发动群众，把体育当作一项群众运动来抓。

2.2 与参与主体身份相关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群众体育的特点

2.2.1 政治服务性

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群众体育的参与主体“国民”、“人民”和“群众”都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文化内涵，以他们为主体的群众体育也有着明显的政治服务性，这一点在中央领导人为“第一届全国工人体育运动大会”的题词中被充分体现。刘少奇的题词是“开展体育运动，增强健康，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周恩来的题词是“开展职工体育运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朱德的题词是“普及人民体育运动，为生产和国防建设服

务”。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开展群众体育的目的就是服务于国家和国防的安全与建设。

2.2.2 自上而下性

从我国的政治权力结构来看，无论是“国民”，还是“人民”和“群众”，都处于下者的地位，而党和政府则处于上者的地位。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国民”在某些方面具有劣根性；“人民”中除了起着先锋队作用的工人阶级外，还有具有某些阶级局限性的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群众”既有革命性，同时又有判断能力低下和盲从的特征，所以“国民”、“人民”和“群众”都具有政治觉悟的局限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他们需要党和政府的领导、改造、发动和规范。只不过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党和政府“不是群众的主人，也不是外在于群众，与之对立的，而是与群众一体的，代表着他们的利益”^[6]。作为我国群众体育参与主体的“国民”、“人民”和“群众”，一方面是新政权的基础，是国家的主体，党和政府要尊重、关心、依赖他们；另一方面，他们因为自身的局限性需要党的领导、改造、发动和规范，我国的群众体育事业也需要在党的号召下，由政府来策划、发动和规范。

2.2.3 整齐划一性

虽然国家强调根据各行各业的特点开展体育运动，但是因为有“为生产和国防建设服务”的总目标，活动项目具有趋同性的特征，全国各行业大都开展田径活动，建立足球队、篮球队、排球队和进行投掷手榴弹的练习。

除了活动项目的趋同性，在参加体育活动的形式上，也有着“一窝蜂”式的一致性。比如1951年11月24日，体总筹委会、教育部、全国总工会等9个单位联合下发的《关于推行广播体操运动的联合通知》出台后，全国各地，无论农村、城市，还是学校、机关，立即掀起了工间、课间、田间做广播体操的热潮；毛主席畅游长江后，全国各地立即掀起大闹江河湖海的游泳运动。

2.2.4 注重规模效应

“国民”、“人民”和“群众”都是具有宏大规模性的群体，在群众体育活动中，党和政府非常重视这种规模效应，这种倾向从当时中央领导人的工作报告和报纸、杂志热血沸腾的报导中可

见一斑,如1954年1月16日贺龙的《1953年体育工作总结报告》中关于“群众性的体育运动有了比较广泛的开展……旅大金州纺织厂7千多职工,有5千多人坚持广播体操,50多个男女排球队、足球队”^[7]的论述,以及有关“吉林延边朝鲜州1954年参加全州农村基层运动会的运动员多达27178人,约占全州青年的三分之一^[8]”的报道,都把参与人数作为群众体育开展状况的重要指标。此类数字一方面掀起了广大群众参与体育活动的热情,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和各类体育组织把数字当政绩也成为当时的一种潮流。颁布《劳卫制》后,达标人数成为衡量群众体育运动开展情况的指标。这种单纯追求数量、追求轰轰烈烈的规模效应的做法最终演变成体育领域的“大跃进”。

3 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群众体育的历史反思

3.1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群众体育发展路线的时代合理性

3.1.1 肩负重塑民族形象、维护国家尊严的历史重任

为了民族的振兴,发展体育、强国强种成为近代仁人志士们前赴后继、不懈奋斗的动力。然而,旧中国腐败的政治、凋敝的经济和落后的文化观念,加之当时的仁人志士们把发展体育的希望过多地寄托在学校体育的孤军奋战上,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的努力最终付诸东流。

只有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并充分挖掘了“国民”、“群众”和“人民”的力量,使体育成为工农大众的权利,使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国民”、“群众”和“人民”成为体育的参与主体,使中国体育走上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真正肩负起重塑民族形象,维护国家尊严的历史重任,完成了民主革命志士们未竟的事业。

3.1.2 实现了体育普及的目标

1952年,荣高棠在全国体育总会第二届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为国民体育运动的普及和经常化而奋斗》的报告中就新中国成立三年来体育运动的成绩提到“(一)扩大了对国民体育运动的宣传……体育运动的参加者在体育运动的实践中,初步认识了体育运动对锻炼体魄的科学价值,对加强国防和生产建设的重大意义……(二)体育活动突破了比较狭小的范围,开始向更广大的群

众中发展”^[9]1954年1月16日,中央体委主任贺龙在1953年体育工作报告中也提到“全国铁路职工中,1950年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有10万人……1953年就增加到52万人,学校学生现在参加体育活动的已较过去更为普遍。体育锻炼标准已在全国较广泛地推行,参加这一锻炼的,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达80万人。^[10]”

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后的4年间,我国人民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激增,锻炼意识加强,在群众体育的“普及”方面,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3.2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群众体育发展的历史教训

3.2.1 群众体育应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体育运动,尤其是群众体育运动,必须以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基础,这是不容违背的历史规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生产力落后,经济基础薄弱,尚不具备使体育运动普及的条件。国家体委不顾客观条件,不考虑群众的营养状况和劳动强度,在全国范围内把群众体育当作政治运动来抓,树“红旗”,学、赶、超。在一路攀升的《劳卫制》达标人数的刺激下,体育浮夸风开始蔓延,从而影响了群众体育的健康发展,这也是当时我国群众体育没有实现“经常化”目标的重要原因。

体育运动是人们的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的自然需求。脱离经济基础的群众体育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在短期内达到普及的效果,但却不能实现“普及化”的目标。

3.2.2 注重差异性,关注群众的需求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群众体育建设中,过多注重了作为参与主体的“国民”、“人民”和“群众”政治上的整体性,而忽略了他们作为“公民”的个体差异性。只有满足各地域、各行业、各种人群的不同体育需求,群众体育才能真正蓬勃发展。

3.2.3 群众体育应遵循来自群众、服务群众的的原则

群众体育,是以群众为参与主体的体育,是为增强群众体质、丰富群众生活而服务的,群众是手段,也是目的。对体育项目、数量、形式的需求都应该来自群众,只有那些能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体育项目、活动形式才能真正得到群众的喜爱,在群众才有生命力,才能有持久性和经常性。

群众体育应该服务于群众,随着我国国力的强大和经济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利益群体的多元化,群众体育单纯“为生产和国防建设服务”的目标和自上而下的领导型管理模式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

4 结语

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市场经济改革的推动下,体育运动已成为人民群众的一种内在需求,从而在一些社区兴起了一些自发的群众体育组织,这些由民间体育精英发起的、群众自我规范、自我治理的非政府体育组织代表了新时代群众体育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 朱德.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会议上的讲话

[J].新体育,1950(1):7.

[2] 冯文彬.新民主主义的国民体育[J].新体育,1950(1):8.

[3] 冯文彬.关于开展人民体育的几个问题[J].新体育,1950(3):4.

[4][9][10] 国家体委,编中国体育年鉴(1949-1991精华本上册),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3:203,198,202.

[5]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7.

[6] 丛日云.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群众”概念分析[J].政法论坛,2005(3):15-24.

[7] 贺龙.1953年体育工作总结报告[J].新体育,1954(41):4.

[8] 张咏勇.农村体育[J].体育史料(11):24.

(上接第43页)

资模式,既是疏通社会资本进入新农村体育设施建设的主要渠道,又能解决长期困扰新农村体育设施建设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2010-02-25.

[2] 张红学.我国新农村建设中体育发展的思考[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1,37(2):24-27.

[3] 郑志丹,许月云.社会公正视野下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创新[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9,32(3):14-16.

[4] 侯斌,陈元欣,雷哲.公共财政视角下新农村体育场地设施投资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1,34(3):19-22.

[5] 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概况[N].中国体育报,

2005-02-03.

[6] 张旭光.我国5年投入118.3亿,农民健身工程受惠百姓3.3亿人[N].中国体育报,2011-02-28.

[7] 黄北翔,杨锋.新时期湖南省农村体育发展现状、制约因素与战略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0,36(7):26-30.

[8] 张永军.新农村建设中体育健身保障制度与中老年人生命历程关系探讨[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10,24(4):49-52.

[9] Health people 2010: National Health,2010 Promotion Objectives[S].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Public Health Serves. Washington DC:DHHSpublication,2010:33-36.

[10] 长千帆.“新农村建设”需要制度保障[J].法学,2007(1):11-21.

[11] 白跃世,田启.后奥运时代我国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构建[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8(4):144-147.